

有利的位置。這個過程顯然同時是行動者主觀意願和社會結構的交互影響（張錦華 2002）。在這個脈絡下，經濟資本展現在作品版稅與文學作品的擁有；文化資本訴諸於作者援用不同知識體系的靈感與資源，讓作品及其主題獲得廣泛的關注，諸如《印刻文學生活誌》以夏曼·藍波安（2005；2015）、瓦歷斯·諾幹（2018）、巴代（2022）為封面人物與專輯主題。社會資本方面，原住民族文學的作者、研究者、文學獎項與出版傳播，共構了資源關係、影響與扶持的互動網絡，這個網絡得以支持作品的出版與肯認，部分成果可參考《山海原住民族文學資源手冊》（2018）、《幼獅文藝》776 期「動詞的原住民文學」專輯（2018）、《文訊》442 期「因為不一樣，所以很美麗：台灣原住民文學」專輯（2022.08）《閱：文學－台灣文學館通訊》78 期「原住民族文學的多樣裁體」專輯（2023.03）；象徵資本，牽涉一套名望、聲譽、信用及認可的規矩，伴隨作品而來的不只是作家的聲譽名望，還包括他筆下的部落、家園與世界因作品而被世人留意與討論。我們可以察覺文學場域中原住民族文學的位置，以及關乎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的互動模式。第六章討論原住民族文學議題為學位論文的趨勢，當作品持續邁向多媒介、多語音的嘗試，學術研究的觸角呼應這些變化。第七章關注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的二個特質：同志書寫與非寫實筆法，並參照千禧世代創作者在這兩個向度下與媒體的高度連結。第八章在台灣外交與地緣政治的脈絡中，理解原住民族與世界南島民族的互動，文學作品如何採取同聲複調的世界南島主軸，唱出自己的歌。這三章深究之主題，得以觀察原住民族文學場域的生成與變化。

三、本書章節安排

「原民振興」側重全球化之下原住民族如何運用資源，以豐厚自身面對未來的能力，本書將指出文學是一個有意思的方法，一種理解為發掘新的可能性與問題的行動。透過再現原初世界、跨文化的辯證、文學

場域生成與變遷這三個向度，以及這三個向度的互涉關係，我們發現作者們選擇性地援用、轉化並回應原住民族知識，從中思索再現的策略與自省的開放性。

第一章〈復返之徑：文學中的族語使用與詮釋〉

本章以「族語」討論口述傳統與書寫文學的關係。族人由側重「聽／說」的口傳系統，轉到了「讀／寫」的書面系統，作家們在族語和漢語之間確認言說的縫隙，透過各種「銜接」和主流文壇、全球社群展開對話。當作家將族語、以及伴隨族語而來的傳統記憶與經驗置於漢語創作時，牽涉的是集體遺產與個人創作之間的關係。我們應重新詮釋作家們表述族語的意義，包括作品主題、形式與族語的連帶關係。具備族語創作思維與形式的漢語文學作品，以及在漢語思維策略下的族語創作，如何成為我們論述原住民族文學的「美學」依據？其中思索，攸關復返的姿態，也將成為原住民族文學美學建構的重要參考。

第二章〈被重述的「歷史」：口述傳統與書寫文學的（解）連結〉

本章以奧威尼·卡勒盛《野百合之歌：魯凱族的生命禮讚》與巴代《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二本長篇歷史小說，回應霍米巴巴「第三空間」概念，進一步觀察「歷史」如何成為口述傳統與書寫文學連結、解連結的方式。學者霍米巴巴提出「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從國族、文化、語言面向探討邊界與交界之情境。「第三空間」指涉殖民與被殖民雙方在持續交流、協商、翻譯的中介空間釋放跨界的文化能量之後，許多新的意義因此產生。奧威尼·卡勒盛營造一個周而復始、運作傳統生活經驗的部落時空，展現其對原初世界的想像與歷史詮釋。巴代一系列的大巴六九部落撰寫，以實際田調與文學想像，揣想過去卑南族人面對時代變革的所思所感。當外界勢力與文字進入部落，巴代以創作回應文字權力的問題，也透過故事情節強調自我／他者、部落歷

史／史料記載相斥相依的處境。「第三空間」的能動性雖然得以證成，不過，在語言、文字與意義的多重張力下，文化身分的論證也就此展開。

第三章〈部落在移動：文學中的都市原住民意象與家園再造〉

「都市原住民」此一現象生成的原因，來自台灣產業的改變與政策推進。戰後台灣產業由農業轉型至工業，國民政府進行山地平地化政策，使得部落青年大舉遷徙至都會謀職。這樣的移動與勞動，對應台灣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因流動而產生新的族群文化想像。在全球化的視域下，「都市原住民」的詮釋有著不同於以往的意義，文學作品再現並反思了這些意義的轉變。本章將從作品中再現都市原住民之意象，探討二個互為相關的命題：一、關注作品呈現都市原住民的一隅、兩地（原鄉／新故鄉）、跨國之歷程，重新省視「家園」的概念，以此思考文化身分的轉變與全球化下弱勢族裔移動的文化意義。二、思考原住民身分的作者，如田雅各、巴代、Nakao Eki Pacida 如何透過都市原住民議題的文學表述，展現文化先鋒、文化邊緣人、文化中介者的發言位置與影響力。

第四章〈災難與文化重建：原住民族風災紀錄與社會韌性建構〉

劫後餘生的族人們，如何創造並適應新的部落整合，無疑是災難之後的一大挑戰。因此，文學所再現的家園重建與文化重構、作家與受難者的距離，提醒著我們後災難時期文本的繁複性。本章將以奧威尼·卡勒盛的作品為主，莫拉克風災相關的作品為輔，從中思考原住民族災難書寫的意義。關切重點如下：一、在報導、重述風災的作品中，「原住民族」不僅是災難記憶與創傷的對象，亦是再現政治的考慮。這些作品包括奧威尼·卡勒盛《消失的國度》（2015）、潘小俠發表《回家的路：好茶村的去從》（2011）紀錄片、王有邦《Sabau！好茶：王有邦影像話魯凱》（2015）、林倩如《古查布鞍遷村一年》（2015）。這些不同文化脈

絡的創作者，如何透過災難現場、災後重建的考察，描繪家園、部落、傳統領域對族人的象徵意義。二、社會科學已從社會韌性的角度，提醒我們應留意原住民族詮釋災難以及自我復原的能力，本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原民的災難書寫如何成為社會韌性建構的一部分。相較於抗議主題，好茶族人奧威尼·卡勒盛以文化身分作為一個支點，以原住民族知識重塑、強化、豐厚內在的社會韌性，並以基督宗教厚實族人面對未來的信心，讓不同族群的讀者有機會認識、尊重一個社群建構認同的過程。因此，書寫的存在，不僅是為了對抗災後的沉默與遺忘，在創造集體感知之下，亦是一個家園再生成之重要策略。

第五章〈文化創傷之路：高砂義勇隊形象的文學再現與建構〉

東亞各國至今仍須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餘緒。學者沃爾夫·坎施泰納（Wulf Kansteiner）表示一個社會對戰爭的紀念與記憶之建立，往往並不只是為了瞭解歷史真相，而是為了當前的政治社會需要（Kansteiner 2002）。高砂義勇隊形象與歷史的澄清，回應台灣詭譎又曲折的歷史際遇，也確認戰爭歷史詮釋、戰爭記憶、戰爭責任、創傷以及人道賠償等責任。文學作品所形塑的高砂義勇隊形象，亦為反思「戰爭」、「集體暴力」與文化身分轉化的路徑。本章以甘耀明、瓦歷斯·諾幹以及吳明益作品為例，闡述高砂義勇隊形象的象徵意義。甘耀明《殺鬼》運用泰雅族神話傳說，以「哈陸斯」、「螃蟹人」無能善終的寓意，描繪因戰爭陰影所造成身體的扭曲變形。瓦歷斯·諾幹在《想念族人》、《戰爭殘酷》，以第一人稱表述身為高砂義勇隊「之後」的處境。吳明益《單車失竊記》延續《睡眠的航線》尋父的歷程，以原住民族泛靈信仰之視角，憐憫因戰爭而受到波及的萬物生靈，批判以人為中心的集體暴力論述。作者們有意識地藉此檢討戰爭的本質，以及戰爭集體暴力展現於身體、身分認同與土地倫理的痕跡。這些書寫，顯現作者以原住民族文化脈絡反思戰爭的意義，有助於思考戰爭之框運作於東亞地緣

政治的軌跡。

第六章〈從邊緣發聲到望向多方：再探原住民族文學的學位論文趨勢〉

原住民族文學的研究關切，回應了台灣族群想像與族群關係的脈動。台灣社會已逐漸肯認原住民族人權、部落人才培育、原鄉智慧、文化永續的重要性，再加上課程建置、展設典藏與世界南島跨國鏈結，這些皆影響原住民族文學學位論文的走向，亦是原住民族文學場域變化的原因。本章將從復返於口傳文學、邊緣發聲之目的以及望向多方的策略，指出原住民族文學學位論文主題的二個趨勢：一、回應傳統的立場。研究者留意神話傳說再現於作品、藝術創作，以此發現口述傳統的當代意義。二、跨界對話的嘗試。除了延續邊緣發聲，彰顯原住民族自 1980 年代以來爭取「我是誰！」的關懷，研究者開始關注各種對話形式，包括文學與音樂、影像的跨媒介研究，也留意作品中多元文化、文化多元的表述。這些與不同世代、不同社群銜接，並進一步深化作品呈現「我可以是誰」的積極姿態，呼應原民振興的見解，呈現原住民族文學研究望向多方、厚實族群主體的趨勢。

第七章〈成為原住民（文學）：原住民族文學獎場域中的同志議題與非寫實風格〉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之建構，文學獎得獎作品與其文學場域是重要議題。1993 年山海文化雜誌社發行《山海文化》雙月刊，推動文學獎機制並衍生後續的書寫世代。其中，千禧世代的加入促成文學獎場域之變遷。二十一世紀踏入文壇的千禧世代（1980 年代之後出生之作者），從小成長於民主化後各種資訊百無禁忌的台灣社會，冷戰終結也為資本打通了更多流通管道，全球市場形形色色的文化產品、美學資源，只要有意願，便多數唾手可得（張誦聖 2017）。千禧世代創作者在媒體高度發

達的環境中成長，書寫者可透過媒體吸收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知識，形成媒體、媒介與文化養成的互相生成（王國安 2016；詹閔旭 2020）。在這個基礎上，本章展開原住民族文學獎場域、千禧世代書寫與文化身分的探討，並從二個面向展開：其一，考察原住民族文學獎的文學場域，論述千禧世代得獎作品在文學場域的位置。其二，分析由原民會主辦、山海文化雜誌社協辦的原住民族文學獎（2010-2020），特別關注千禧世代書寫者的得獎作品。筆者將指出作品中關於同志議題與非寫實風格的嘗試，是作家作品面向文化身分轉變之具體實踐。

第八章〈以「南島」為名：原住民族文學中的認同政治與島嶼想像〉

在考古人類學、語言學、基因學者的努力下，台灣南島語言的獨特性進一步確認「出台灣假說（out of Taiwan Hypothesis）」——台灣是南島語族原鄉的可能。台灣原鄉論雖然受到不少挑戰，卻成為執政者政策發展的立論基礎。執政者望向南方，將台灣置於南島語系、南島民族、南島文化的樞紐位置，努力擴大外交版圖；另一方面以「南島」為名的想像，在國際政治、外交突圍之外，揭示了 1990 年代至今台灣人認同的複雜論辯。本章以「南島」為切入點，梳理 1990 年代以來台灣南島文化建構的軌跡，並指出原住民族作家作品如何在其中實踐與反思。在台灣國族主義運動、原運的脈絡下，「南島民族」二元對立於「炎黃子孫」所指涉的漢人、中華文化以及中國。相較於此，原住民族作家作品留意文化交會的辯證關係。《山海文化》主編孫大川透過原住民族漢語文學指出文化中國與文化南島對台灣的影響，提出南島語言作為檢視台灣歷史縱深的方法；夏曼·藍波安以生活經驗界定我群為「海上的人」，更以海洋為家國之立場挑戰南島民族的血緣、語言分類，突顯海洋民族認同的張力。作家作品所展現的南島觀點，其意義不只是突顯不同主體論述「南島」的差異性，亦間接反省台灣以南島為名的國家治理與族群政治。